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Aihwa Ong.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2pp.

蔣其綦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Aihwa Ong 在本書中分析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全球資本主義邏輯運作下，主權統治技術和公民權利義務的多重互動關係。這本書承繼作者以往對移民社群細膩的觀察，針對其跨國經濟活動、政治動員和文化認同，提出在東南亞國家之間，統治階層所制定的政策方針，不但反映其文化、社經結構和族群歷史的差異，造成新自由主義的實現方式與西方國家不同。國家之內，社會團體也因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中的位置不同，享有不同的權利義務關係。與同類書相比，作者對結構上相對弱勢的國家和社會團體，多了一份關切。她點出經由對新自由主義的重新詮釋，非西方國家創造出某種程度的自主權。經由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或請求政府的有限度的介入，社會上的弱勢團體，即有可能改變既有的處境。

作者一開始即點明新自由主義在不同情境脈絡下，提供主權國家和社會團體不同的機會與挑戰。對於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統治階層和社會團體而言，如何獲取新自由主義資本累積的最大利益，增強國家競爭力，同時保護境內弱勢公民團體的權益，成為書中作者關切的焦點。本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新自由主義對既有倫理秩序的挑戰。第一個案例，作者分析新自由主義對於馬來西亞女性爭取兩性平權的影響。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運作下，國家需要大量的女性勞動力。過於激進的宗教意識形態，不利於跨國資本的累積。因此政府會選擇性地提倡兩性平權，鼓勵女性進入職場。同時，國際會議與跨國學術文化交流，提供一個溝通的平臺，創造西方女性學者和非政府組織與當地女性團體合作的機會，挑戰既有的父權結構和保守勢力。經由重新詮釋可蘭經中女性的角色，馬來西亞的女性主義團體證明她們可以不是男性的附屬品，進而要求平等的權利。這些女性主義團體在強調女性與男性一樣的過程中卻也提

倡守貞，企圖打破女性情慾和感情用事的刻板印象，塑造出一個理性權威的公共形象。第二個案例，作者分析在印尼排華事件中，華人網路動員的利與弊。當印尼排華事件發生時，一些身處西方國家並精通於網路的海外華人設立網站，聯絡動員，組織各地使館前的抗議活動。其行動訴求在強調華人認同以及被欺凌的歷史經驗，呼籲印尼政府保護華人，中國政府也提出抗議。當作者在描述印尼當地特殊的政經文化和族群關係時，細膩地點出印尼當地組織動員與西方華人透過網路全球動員之間，有著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的差異與矛盾。

第二部分的主題是統治的空間。作者分析國家如何彈性分割主權，以達到統治和資本累積的最大效益。作者的第一個案例是，分析東南亞國家如何策略性地設計一系列的人口和經濟政策，配合都市計劃的施行，以獲得資本和技術最有效能的運作，並保障特定族群和統治團體的利益。每個國家內的次團體（性別、族群、階級等），依照其資本和勞力市場的價值和統治需要，賦予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團體內個人之公民權利和身分則呼應其市場角色之分工，身處社會不同的位階。同時，這些策略性地人口和經濟政策，提供東南亞國家之間合作競爭的基礎，創造功能性地政治、經濟和技術移轉的合作關係，以及宗教道德統治的正當性。第二個案例，分析亞洲國家，經由長期地都市規劃，設立特別區域，達成多重政治和經濟的目的。在特定區域中，新的立法和選擇性地應用既有的法條，國家重新定義適用於全體公民的國家、領土和主權概念。以中國為例，特別經濟區的設立，目的是為了吸引跨國資本，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國際貿易，以增加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場域的影響力。許多沿海經濟區域的設立，都是有計劃地針對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配置資本和勞力流動的路徑。政治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以香港為例，一方面作為海外華人資本進出中國的通路，同時實驗有限度的民主；另一方面設計其成為跨國人才資本流通的市場，連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周邊國家。

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些特別區域展現政治極權和自由經濟融合的一種方式，相對於一般的工業區和地區性金融中心，這些特別區域直屬中央，為了政治目的，政府可制定彈性的勞工和融資政策，選擇性地獎勵國營、私有和跨國企業。或者，經由政策，控制特定國家在中國投資的影響力。對國家內部的統治而言，這些特別區域可成為一個過渡期的緩衝區，將經濟的互依互存轉化成為政治上談判的籌碼。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中，作者分別討論了專業知識的流動和各種邊陲遊牧者的形成。論文焦點轉向在資本主義擴張與國家利益考量下，尋找出路的公民與非公民團體。作者分析在自由經濟市場影響下，跨國勞工的形成、教育體制的設計和專業技術的認定，對於國家區隔公民市場價值的合法性，產生不同的機會與挑戰。書中提到西方學術社群和非政府組織，長期關注非西方社會的弱勢團體，積極地與當地婦女和勞工組織接觸，建立社會運動的基礎。但是，因為研究的限制，弱勢團體議題的討論並未深入，社會變遷的可能性相對降低，因而有些美中不足之處。

不同於之前特別區域的討論，書的後半段分析國際性大都市，在國家長期計畫發展目標下，所展現的特殊功能和位置。以大都市周邊的學校和實驗室為例，許多新加坡和美國的科學園區和實驗室，屬於國家級計畫的一部分。為了吸引跨國資本和人才，國家提供住居民身分及周邊軟硬體的配套措施。許多在科學園區和實驗室工作的人，擁有多重國籍身分，也因此他／她們的權利和義務與一般單一國籍的公民不同。這些跨國專業人才習慣遊走在不同國家的制度和文化的，在一些特定的議題上與當地住居民的利益並不相同，成為一個特殊的團體。他／她們不熱衷政治，也不會對特別的政黨／政體效忠，但注重長期地職業生涯規畫和孩子的就學環境。

在同一個都市裡，還存在許多弱勢團體。像是從鄉村來到都市的勞工，或是尋求比較好生活機會的跨國女工，因為她們的低教育程度和社經地位，使得她們在與雇主爭取權益和議價的過程中，趨於絕對地弱勢。而一些經由勞工仲介取得工作身分的人，因為相關法律的限制，則使得他／她必須受制於雇主不平等的要求。總結而言，在國家積極介入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下，國家利益改變法律的規定，使其盡量滿足資本和人才的跨國流動。但同時限制低技術、低教育程度勞工取得正式的公民身分，成為國家的一部分。但是在此情形之下，非政府組織紛紛出現，訴諸道德或強調身為人基本的權利與價值，開始對弱勢團體權益展開保護。可惜的是作者並未進行完整的田野調查，所以並不能詳細地呈現公民身分和權利義務如何在國家邊緣位置進一步地變化，改變其弱勢的處境。

總結來說，全書對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討論多所著墨，特別是在二次戰後亞洲和東南亞國家的政經發展，政府主導規畫財經和勞動市場政策，扶植策略性

地國營和私有企業，管制進出口貿易和勞動價格等。作者沿襲傅柯理論，分析國家為了迎合市場，主權展現的多種可能。例如都市規畫不但是國家競爭力的展現，在特定時空下，也可達到統治的目的。都市空間裡的人因為身分、市場價值的不同，國家制定配套的法律，給予不同的權利和義務。但藉由強調人的基本價值，弱勢團體或許也有機會保障其基本權益。簡言之，新自由主義的運作，改變國家統治的技術，市民社會的興起，挑戰既有的權力、權利和秩序。對於跨國資本、國家主權、都市規畫，和公民權利義務等議題有興趣的讀者，此書是個不錯的選擇。